

邓小平走过的一条炉灰渣路

□ 朱 虹

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邓小平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为方便小平同志上下班，工人师傅们从工厂后墙开了个小门，并用炉灰渣铺了一条500米长的小路直通陆军步兵学校的住所。小平夫妇风雨无阻来来回回在这条小道上走了三年零四个月。人们把这条小道称为“小平小道”。

这是一条蜿蜒曲折、长满杂草的田间小道。路不宽，也不是很平，两旁就是庄稼地。这又是一条特殊的小道，小平同志每天往返于这条小路上，乱象丛生、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故事时时都在上演，他观察着，思考着，等待着，用自己坚实而稳健的步伐走出了一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大道。邓小平夫人卓琳说：“从小平小道延伸出去的，是一条通往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事实证明，小平小道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策源地，这里是小平同志蛰伏等待之地、改革开放的思想孕育之地和行动起源之地。

蛰伏等待之地

小平小道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策源地，在于它为邓小平提供了一个学习、观察、思考的相对宽松环境。在江西的这3年多时间，对邓小平而言是政治人生的低谷，但又是蛰伏等待的3年。他利用这个安静的环境，不断地学习、思考、提高，积极地锻炼身体，为领导改革开放作了充分的智力和体力准备。

1969年，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一起，被送到江西南昌，接受劳动锻炼再教育。江西省为小平同志提供了较为安静宽松的外部环境，让他得以摆脱“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乱局。

在刚定邓小平下放江西时，周恩来就亲自打电话给江西省有关部门负责人，要求不能将小平同志安排在赣南山区而是安排在南昌市郊区。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保证邓小平生命安全的重要保障。小平同志的住所被安排在一个军事驻地南昌陆军步兵学校（今解放军陆军步兵学院），这样就避免受到冲击，工作地点则安排在附近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新建县也严格规定任何组织、个人不准干扰小平同志工作。

较为宽松的环境让邓小平得以安心读书思考。下放江西时，邓小平从北京带来大量书籍。平日午饭后，小平同志都会小睡片刻，然后阅读带来的书，除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外，还有历史、文学、哲学、传记等方面的书籍。晚上10点上床后，小平同志还会读一个小时的书。1971年，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说：“这两年我每天早上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在江西的3年，邓小平得以超脱地观察复杂的政治局势，他系统地阅读了马列经典著作并在学习中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坚定了改革开放的信念。

较为宽松的环境也让邓小平的身体得到了锻炼和恢复。刚到江西时，邓小平身心疲惫，每晚要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后来，生活工作趋于稳定，他就开始锻炼身体，坚持用冷水洗头洗脸，每天坚持走路锻炼，饮食也得到较好保障，身体状况得到恢复。据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说，“父亲在北京挨批的时间里身体消瘦，面容憔悴，到了江西后体重又开始增加，活动增加，一改刚来时的瘦削和憔悴，人胖了一些，精神也好了很多”，“多年来吃安眠药入睡的习惯也改掉了”。

健康的身体保证了邓小平为党和

国家继续工作，在1973年他接到中央的回京通知后，感慨地说：“我还可以干20年。”事实上，邓小平回京后，又为党工作了20年。这是他人生经历中最辉煌的20年，也是受到国内外评价最高的20年。

思想孕育之地

小平小道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策源地，在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思想在这里孕育。在学习和锻炼之余，小平同志有了更多的时间来进行思考。他在小平小道上一天又一天地走着，对“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本质、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国际环境等问题都有了较为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改革开放思想的萌芽，为后来的全面整顿及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1986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贝宁总统时说：“‘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两次，这种经历并不都是坏事，使我有机会冷静地总结经验。因为有了那段经历，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提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在小平小道上，他深深思索着社会主义的本质。在小平小道3年多的时间里，邓小平广泛接触了革命老区的社会状况，对最基层人民的生活有了更直观地了解，对社会主义本质有着自己的思考和认识，开始有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基本观点。有一次，一位工人家长仅仅因为孩子把买来的豆腐摔得稀烂而痛心不已，把孩子狠狠地打骂了一顿，那块豆腐是他下了好久决心才买来做“大餐”改善生活的。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小平同志清晰地认识到，发展经济，解决贫困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检验社会主义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

在小平小道，邓小平通过短波电台了解到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情况，

也意识到了加强对外交流、引进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是促进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有效途径。邓小平复出后就针对工业现代化，多次强调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他就亲自前往美国、日本等进行考察，美国、日本的先进技术设备，大量的低息、免息的资金得以进入中国。他鼓励发展外向型经济。20世纪之初就留学法国的邓小平在江西目睹了中国落后的劳动生产力，对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他在瑞金考察时尖锐地指出：“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四十年，还需要努力。”

行动起源之地

小平小道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策源地，还在于它是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及改革开放的行动起源之地。如果没有小平小道的3年，就没有1975年小平同志复出后大刀阔斧的整顿和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大胆而强有力的举措。卓琳同志说，“通过三年的观察，邓小平更加忧思国家的命运前途。通过三年的思考，他的思想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信念更加坚定。这些，对于他复出不久即领导进行全面整顿，以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

1975年1月，邓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他把在小平小道的思考用于国民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立即大刀阔斧地领导整顿。

（摘自2018年第10期《时代主人》，原标题《小平小道——改革开放的策源地》）

最早提出对外开放思想的一次谈话

□ 李正军

1978年9月8日，邓小平应金日成之邀对朝鲜进行了一次短暂访问。回国后，他没有直接回到北京，而是在东北三省及河北、天津进行了一次刻意安排又极其重要的调研活动，一周之内，他不顾74岁高龄和旅途疲劳，7天走了8个城

市，一路上邓小平边听、边看、边讲，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提出了许多带有突破性的观点和看法，史称“北方谈话”。“北方谈话”正是在党和国家处于徘徊状态的关键时刻发表的，为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和发展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

础，为之后改革开放做好了重要的思想发动和政治动员。

“北方谈话”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涉及到社会生活和生产问题的方方面面，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还最早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思想。邓小平指出，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必须重视对外开放。邓小平在本溪谈到：“要到发达国家去看

看，应当看看人家是怎么搞的。过去我们对国外的好多事情不知道。”在长春时他指出：“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

（摘自2018年第12期《党史纵览》，原标题为《改革开放的前奏：邓小平“北方谈话”》）

第一个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

□ 江 琳

1984年，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县（现为南安市）的一家港资企业（现为南安市）的一家港资企业“南丰针织厂”（现已发展成为南益集团），成立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非公有制企业党支部。作为一家港资企业，党员在企业创办、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为企业化解了危机。

改革开放初期，以林树哲为首的董事会决定回乡投资，在南安官桥镇办起“来料加工”的南丰针织厂。清车间、搬杂物、刷墙壁、铺地板……短短一个月，

靠着党员们的一双双手，车间变得干净整洁；手抬肩扛，第一批115台机器由党员卸下来安装，工厂开始运转。党员们吃苦耐劳，林树哲等管理层都记在心上。1984年4月，南丰针织厂党支部正式成立，成为全国第一家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共有党员6人。此后，企业不断发展，1997年6月，集团党支部升格为党委，成为福建第一个跨地区成立的非公有制企业党委。

（摘自2018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闽南第一枝报春花》）

第一家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的企业

□ 沈文敏

1987年3月，上海市响应中央号召，搞活劳动用工制度，选择建设机器厂作为试点。一个月后，厂内各车间用工部门，与占全厂工人总数83%的固定工签订了为期半年的试用合同，期满后经考核合格又签订了正式的上岗合同。在这期间，全厂有11名工人因不合格而转岗、下岗，有7名在二、三线的工人因考核成绩突出被充实到一线岗位。

与此同时，厂里还配套改革了工资和培训制度，建立了正常的升级制度，加强工人技术等级和转岗培训工

端走“铁饭碗”，取消“大锅饭”，厂里出现了可喜的景象：愿意上一线岗的人多了，努力学习技术的人多了，满勤、勤快干活的人多了。很多工人为了达到最高生产指标，8小时干不完，下班后继续干；提前干完了，又来找活干。

同时，企业经济效益有了明显增长，1987年企业上缴税利比核定基数增长10.2%，年人均创利达到6549元，年人均全员劳动生产率达21900元，均居全国同行业之首。

（摘自201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首家打破铁饭碗的企业》）

第一个设立“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企业

□ 贺林平

1978年7月，一场打破铁饭碗的改革悄悄在广东省清远县氮肥厂试行：拿出5万元设立综合奖，和产量挂钩，根据每班（8小时）的最高产

量定三个等级，一等奖每人奖1.2元，二等奖1元，三等奖0.8元。干得多的工人，除工资外，每个月还能再拿一二十元的奖金。

效果立竿见影。1979年厂子就扭亏为盈，年产量从不到3000吨很

快增长到1.5万吨；一口气在外面购买和建设70多套职工住宅，还办了学校。“职工面貌焕然一新，真真叫‘干部带头干，工人跟着干，重活抢着干’。”当时主管生产技术的王挺回忆。

尝到甜头的清远，顺势推广广

肥厂经验，在其他县办国营工厂推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创造了“清远经验”。

（摘自2018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敢为人先成就了清远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邓小平就在考虑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团结更多的人，一心一意实现党的经济建设目标。他认为，一直靠边站的原工商业者海内外联系广泛，有丰富的经商办实业的经验，是未来经济建设不可忽视的力量。

恰逢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代表人士聚集北京开会。邓小平知道后，提出要见一见工商界的老朋友。于是，他提了一个名单，共有5人，分别是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和周叔弢。

接到中央办公厅发来的通知，五老激动异常，思绪万千。他们一早便来到福建厅等待邓小平。厅里很温暖，工作人员也已准备了热茶招待五老。邓小平准时到来，并与五老亲切握手。随同的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国务院副总理、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陈慕华以及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

邓小平开门见山：“今天，我先向老同志们介绍一下20多天前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邓小平称五老为“老同志”，无形之中便拉近了距离，使五老感到了信任。

介绍完会议情况，邓小平又对五老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很高兴。今天就谈这个问题。”

于是，会谈便在这样的亲切、融洽、毫无距离感的氛围之下愉快地进行着。谈论的话题，相当有料。比如，五老代表的民族工商业者共同的愿望：把资本家的帽子摘掉。胡子昂就这一问题进言：“现在工商界还没有搞掉帽子，一些企业把工商者同地、富、反、坏、新生资产阶级不加区别地相提并论，这些问题不解决，他们心有余悸就难以消除顾虑。”

邓小平马上表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女子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二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怎么用钱？邓小平的想法是：鼓励原工商业者出山开办企业。邓小平说：“现在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太大了，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就着这个话题，“五老”的话匣子打开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气氛一下子变得融洽、热烈。

胡子昂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要大力起用人才，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把他们找出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

邓小平立即表示赞赏：“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较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和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是国内的人，还有在国外的人，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

邓小平进一步吩咐五老：“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

荣毅仁当即建言可以吸引外资兴办实业。他建议：“现在外汇很有限，引进外资要很快生效，目的性要明确，要功利性大些，生产的产品要能换取外汇，出口创汇。只要生产提高了，就不怕没有偿还能力。现在要搞好生产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工资问题，我们过去办厂，每年要增加一次工资。另一个是管理问题，没有民主就没有主人翁感，就不动脑筋；机构多头，划圈的人多了，办事效率就低，生产就不会搞好。”

荣毅仁的话，让邓小平若有所思、频频点头。他果断表示：“搞补偿贸易，有相当的外汇收入，起码广东、福建两个大省大有希望，两省在外的华侨很多，江苏、浙江也有。我看，海外同胞、华侨、华裔都可以回来办工厂企业。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

改变中国命运的一顿火锅

□ 王菲

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停了一下，邓小平又说：“现在国家计划想调个头，以前我们一直是工业以钢为纲。这大家伙，资金周转慢。我们要先搞资金周转快的项目，如旅游、轻工、手工业、补偿贸易等，换取外汇，而且可以很快提高人民生活。到那时，偿还能力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我们的人都很聪明，千方百计选择快的来搞，不要头脑僵化，党中央对你们原工商业者寄予厚望，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

座谈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大家谈兴甚浓。细心的邓小平平抬腕看了一下手表，风趣地说：“肚子饿了，该吃饭了，今天我们相聚，我请大家吃涮羊肉。”

“五老火锅宴”正式开始。五老火锅宴，加上时年75岁的邓小平，实际是六老火锅宴。说是宴请，其实也只是家常便饭。吃的是老北京传统涮羊肉，白水锅底、羊肉片，还有大白菜。

“五老火锅宴”结束了，但它在原工商业者心中燃起的热情和希望，变成了一席民营经济发展的盛宴。此后不久，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办起了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周叔弢在天津创办建华经济技术咨询公司。

当年由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王光英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光大实业公司，如今以“中信”和“光大”闻名，已成为著名的国际化大公司。

1979年9月22日，一些老工商业者利用境外的部分民间集资在上海创办了一家公司“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的企业，后被认定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第一家民营企业。

1979年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开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会议。会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报告，批对我国正面临着大批知青返城、城镇待业人员积压七八百万的巨大压力提出：“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一份关于允许个体经济发展的报告。当年年底，全国个体从业人员一下子冒出来31万人，比1978年整整多了一倍还多……

“一只火锅，一台大戏”。火锅宴后，我国民营经济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一台中国民营经济的大戏就此上场。从40年前青涩的亮相，变成了鼓乐喧天的时代交响曲。

（摘自2018年10月29日《中华工商时报》，原标题为《五老火锅宴：开启民营经济的盛宴》）